

薛

宇飞
◎编

王國維 研究資料要目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崇文书局

薛宇飞 编

王國維研究資料要目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崇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国维研究资料要目 / 薛宇飞编. — 武汉: 崇文书局, 2011.6

ISBN 978-7-5403-2028-7

I. ①王… II. ①薛… III. ①王国维(1877~1927)—人物研究—研究资料
IV. ①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03939 号

王国维研究资料要目

出 版: 崇文书局
地 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邮 编: 430070
发 行: 崇文书局(027-87679712)
印 刷: 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027-87863005)
开 本: 710 × 1010mm 1/16
字 数: 200 千
印 张: 15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3-2028-7
定 价: 26.00 元
编辑邮箱: taishubo@126.com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静安先生肖像

前 言

王国维静安先生治学善用分类法而重视目录学,其扎实的根柢益以清晰的条理和充分的材料,所以能成就绝世之业。考察其治学的方法,可知无不遵循占有、整理、分析学术材料的路径,而整理为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正如王国维先生于词学研究有《词录》、于曲学研究有《曲录》,于古文字研究有《宋代金文著录表》、《国朝金文著录表》等。笔者学识浅陋,于先生之学术愧不能有所称述,姑以此编呈正于大雅君子,庶几可免搜查翻检之劳。

一、王国维生平、学术成就和影响

先生初名国桢,后改名国维,字静安、静庵、伯隅,号人间、礼堂、东海愚公、永观、观堂。

清光绪三年十月廿九日(1877年12月3日),先生出生于浙江海宁州城(今海宁市盐官镇)。先生父乃誉(1847—1906),字与言,号莼斋,晚字承宰,号娱庐,曾为江苏溧阳县幕僚十余年,后弃儒业商,善书画,有著作传世。父亲虽对静安先生要求严格,但也相当开明。先生少负才名,与同乡陈守谦、叶宜春、褚嘉猷被称为“四才子”。又生当经济社会文化急剧变革的时代,思想上受时势的影响很大,因此“不沾沾于章句,尤不屑就时文绳墨”、“癸巳大比,不终场而归”、“无意科名”(陈守谦《祭王忠愍公文》),“未几而有甲午之役,始知世尚有所谓学者,家贫不能以贗供游学,居恒快快”(《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一》),表现出先生鄙薄功名的人生志趣和游学四方的远大志向。

先生生平治学经历可分为五个时期,即前上海时期、前北京时期、日本京都时期、后上海时期、后北京时期。

前上海时期(1898—1906),先生22岁到30岁。此期,先生主要以上

海为活动地域,其间仅在武昌、日本有短期工作、学习经历,并先后在南通师范学校、江苏师范学堂任教共两年半。1898年,先生只身前往上海,受友人推荐,在汪康年、梁启超等所办的《时务报》馆任书记职务,同时在雪堂先生等所办的东文学社内学习日文和英文。其后在六七年的时间里,先生主要是协助雪堂先生翻译农学书籍、编辑《教育世界》杂志等。这个时期是静安先生潜心学习、翻译、写作并逐渐步入学术研究的时期。此时,先生醉心西方哲学、美学,在前后九年的时间里,学习通晓了日文和英文,认真研读翻译了康德、尼采、叔本华、席勒等众多西方学者的重要著作。写出了不少议论犀利、很有见地的文章。尤其是在1904年,年仅28岁的静安先生便完成了立论高蹈、影响深远的《红楼梦评论》一文。此期所作诗词也充满哲理韵味,无不反映出他对人生、对宇宙、对社会的深刻思考。诸如“人生过处唯存悔,知识增时祇益疑”(《六月二十七日宿硖石》)、“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浣溪沙·山寺微芒背夕曛》)、“终古众生无度日,世尊只合老尘嚣”(《平生》)、“人间总是堪疑处,唯有兹疑不可疑”(《鹧鸪天·阁道风飘五丈旗》)、“我身即我敌,外物非所虞”(《偶成》)等句,洵非常人所能道出。

前北京时期(1907—1911),先生31岁到35岁。1907年,静安先生经雪堂先生推荐,任职学部,充图书编译局编译、名词馆协修。此时,静安先生“疲于哲学有日”、觉“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而“知其真理,又爱其谬误”(《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二》),在学术思想上陷入巨大的矛盾和痛苦中,故先生在学问上的志趣已由先前的哲学、美学渐移于文学。此期内,先生的学术成就除诗词的成功外,就是文艺论著的写作,《曲录》、《戏曲考源》、《唐宋大曲考》、《古剧脚色考》等均撰著于此时,影响极其广泛的《人间词话》也发表于此时。

日本京都时期(1912—1915),先生36岁到39岁。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静安先生举家随雪堂先生往日本避居。此后,先生从雪堂先生之劝勉,始弃早年所学,而潜心于古史、古文字研究,在学术研究上发生了很大的转折。受到当时学界耆宿沈曾植赞赏的《简牍检署考》和盛名远播东洋

的《宋元戏曲考》均撰成于此时。其他如《洛诰笺》、《明堂寝庙通考》、《释币》、《鬼方昆夷猃狁考》、《生霸死霸考》、《胡服考》、《宋代金文著录表》、《国朝金文著录表》等重要著作均于此期发表于雪堂先生所办的《雪堂丛刻》上。

后上海时期(1916—1922),先生40岁到46岁。1916年初,先生自日本归国,入英籍犹太人哈同所有之哈同花园(爱俪园),主编《学术丛编》,并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1919年到1922年间,兼为蒋汝藻编撰《藏书志》。1922年起,兼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讯导师。此期,静安先生在学术研究上已经相当成熟,在古文字、音韵、考古、经学、史学、版本学等诸多方面均有重要论著。名著《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及《殷周制度论》等均撰定于此时。生平重要著述汇编为《观堂集林》,由友人蒋汝藻印行。《传书堂藏善本书志》的写作也已基本完成。

后北京时期(1923—1927),先生47岁到51岁辞世。1923年,先生北上充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同时兼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此期,先生属意于《水经注》的校勘,并逐渐转入蒙元史和西北史地的研究,并已着手做了大量的资料整理工作,写出了多篇极具价值的学术论文。

民国十六年五月初三(1927年6月2日),静安先生赴颐和园,从容自沉昆明湖。先生的死,留给后人的思考是多方面的,但正如梁任公先生所说:“王先生的自杀是有意义的,和一般无聊的行为不同。”(梁启超《王静安先生墓前悼词》)人们在惋惜他过早地结束自己学术生涯的同时,又对其死因有种种的推测。孟子有云: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静安先生具深邃的哲学思想,对人生、社会有极深刻洞达的认识,也许在投湖的那一刻,他已经参透了生死之间的玄机。

静安先生的学术成就在先生生前就已为人们所认识,他在学术研究上取得的一个个突破性的进展至今为人所瞩目。有人认为,静安先生学无根柢、仓皇立说以炫耀后生,这是有失公允的。正如梁任公先生在《王静安先生纪念号序》中所论:“先生之学,从弘大处立脚,而从精微处着力。……其所讨论之问题,虽洪纤繁简不一,然每对于一问题,搜集资料,殆无少遗

失,其结论未或不殚心切理,骤视若新异,反复推较而卒莫之能易。”这样的说法,也是为现在新的研究所证实了的。虽然静安先生的研究也有可商榷之处,但先生的“新说”是建立在充分占有材料并认真分析材料的基础上的,而不是毫无根据的臆测。正是这种实事求是、勇于创新的精神,使得先生脱胎于“章句小儒”,而成为引领时代学术潮流的一代大师。现在,先生的影响已经超出了纯学术的范围,除有“王国维戏曲论文奖”的设置外,笔者还注意到,不仅“领导干部读经典”系列中有《王国维讲词曲》、《王国维、蔡元培、鲁迅讲红楼》两种(均为长征出版社2008年版);“语文新课标必读书”中更有《王国维》(张晓芸编著,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一种,介绍了静安先生的生平,选收了适合中学生阅读的静安先生著作多篇。另外,往年的高考中也数次出现和静安先生或其著作有关的题目,更不用说市面上不胜枚举的《人间词话》的各种读本了。

静安先生在学术上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巨大的遗产,我们至今受用不尽。笔者认为,王国维在学术思想、治学方法、学术品格上给我们树立的典范,更值得后人继承发扬。

其一,主张学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之分。在近代西学东渐的浪潮下,学者不是持激进的西学主张,就是坚守传统学术方法,不肯放手接受新理论、新方法。静安先生青年时醉心西方哲学、美学,后来则能够兼容并蓄,这“不仅使他受到了当时新旧各派学者的一致推崇,也为其学术上的巨大成功奠定了重要基础”(《王国维全集·前言》)。正如梁任公先生所论:“(静安先生)少年喜谭哲学,尤酷嗜德意志人康德、叔本华、尼采之书,晚虽弃置不甚治,然于学术之整个不可分的理想,印刻甚深,故虽好从事于个别问题,为窄而深的研究,而常能从一问题与他问题之关系上,见出最适当之理解,绝无支离破碎专己守残之蔽。”(《王静安先生纪念号序》)这种开明的学术思想是极具现代学术精神的。

其二,“不轻疑古”、“有疑姑阙”。关于此点,先生在《古史新证》和《金文编序》中所论最为明白透彻:“汲冢所出《竹书纪年》,自夏以来,皆有年数,亦《谍记》之流亚。皇甫谧作《帝王世纪》,亦为五帝三王尽加年数。后

人乃复取以补《太史公书》，此信古之过也。至于近世，乃知孔安国本《尚书》之伪、《纪年》之不可信，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古史新证·总论》）“余案阙疑之说出于孔子，盖为一切学问言。独于小学，则许叔重一用之，荀勖辈再用之，杨南仲三用之，近时吴中丞再用之。今日小学家如罗叔言参事考甲骨文字，别撰《殷虚文字待问编》一卷，亦用此法。而希白是编，与参事弟子商锡永《殷虚文字类编》用之为尤严。至于他学，无在而不可用此法。”（《观堂别集·金文编序》）孔子曰：“过犹不及。”在学术研究中，如何恰当地利用学术材料，既不失之轻疑，又不失之轻信，是一项很重要的功夫。静安先生的做法可为我们提供一个典范。尤其是“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一语，给我们以莫大的启示。

其三，对学术研究方法和学术原创性的重视。在这方面，先生不仅自觉地在文章中运用演绎、归纳和辩证等逻辑方法，而且视原创性为学术研究的生命。静安先生的著作，都是逻辑严密、很有条理、中心明确，论述条贯而无散漫之弊。正如梁任公先生说：“王先生的《观堂集林》，几乎篇篇都有新发明，只因他能用最科学而合理的方法，所以他的成就极大。此外著作，亦无不能找出新问题，而得好结果。其辩证最准确而态度最温和，完全是大学者的气象。他为学的方法和道德，实在有过人的地方。”（《王静安先生墓前悼词》）陈寅恪先生也说：“其学术性质固异同，所用方法亦不尽符合，要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序》）可见先生的治学方法和学术创新在当时就已经为人称颂。这也是值得我们今天进一步学习发扬的。

二、王国维著作的编集

静安先生辞世后的第二年，雪堂先生就主持编辑了他的第一个全集，即《海宁王忠愍公遗书》。这是筌路蓝缕、导夫先路的工作，虽然难免存在一些不足，但却是以后各种全集的基础。194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王国华、赵万里等编集的《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这是静安先生的第二个全

集。这个全集在《王忠愍公遗书》的基础上,做了订补增辑,曾经是先生全集通行的本子。此后的两种全集都是在台湾编辑出版的:一是文华出版公司1968年版的《王观堂先生全集》,一是台北大通书局1976年版的《王国维先生全集》。两种全集均以《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为基础影印,而增入了不少资料,但就先生全部存世作品看,仍是“全集不全”。2009年,由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的《王国维全集》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和广东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该版全集凝聚了几代学者的心血,除少量信札外,收入了迄今所知的静安先生的全部作品,并均经点校整理,是名符其实的全集,也是现在阅读先生著作最为便利的本子。

另外需要提及的是先生往来手札的整理发表。先生书札的整理,始于罗继祖先生,由其据所藏先生书信手稿整理的《观堂书札——与罗振玉先生论学手札》和有关方面据故宫博物院所藏书信手稿整理的《观堂书札——与马衡先生论学手札》先后发表在《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上。之后以中华书局1980年版的《王国维全集·书信》蔚为大观,收入静安先生致他人手札五百余通。此后,静安先生往来手札不断被整理刊出。现在,先生往来手札的大部分均已正式结集出版,主要有《王国维全集·第十五卷(书信日记)》(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王国维未刊来往书信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当然,由于种种原因,这还不是已知的先生往来手札的全部。

三、对王国维先生的研究情况

(一)对先生生平、思想和学术成就的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表现为各种学述、年谱、传记和著述目录的撰著编辑。笔者以为,这是在静安先生研究上已经做得比较扎实的一项工作。这方面的资料,较早的有朱芳圃《述先师王静安先生治学之方法及国学上之贡献》、吴其昌《王观堂先生学述》、《王观堂先生生平及其学术》、容庚《王

国维先生在考古学上之贡献》、王恩洋《王国维先生之思想》等，这些文章或为先生弟子所撰，或为同时人所撰，对我们今天研究静安先生及其学术有重要参考价值。另外如先生年谱，重要的有赵万里编《海宁王静安先生年谱》、王德毅著《王国维年谱》、陈鸿祥著《王国维年谱》、孙敦恒著《王国维年谱新编》、袁英光、刘寅生著《王国维年谱长编》等。传记则有萧艾、袁英光、刘烜三家的《王国维评传》和陈鸿祥的《王国维传》、周一平的《中西文化交汇和王国维学术成就》等。著作目录、提要类则有赵万里编《王静安先生著述目录》、《王静安先生手批手校书目》、《静安先生遗著选跋》、储皖峰《王静安先生著述表》、洪国梁《王国维著述编年提要》、周一平《王国维著述年表》、胡逢祥《王国维著译年表》等。传记资料汇编类有《追忆王国维》、《王国维传记资料全编》等。此外还有专门就先生之死相关资料和论文汇编成册的《王国维之死》，专门研究静安先生和雪堂先生关系的《王国维和罗振玉》，等等。

（二）对先生作品的注释、选编

这方面以《人间词话》和诗词作品的注释解述为多。重要的有徐调孚《人间词话校注》、滕咸惠《人间词话新注》、萧艾《王国维诗词笺校》、田志豆《王国维词注》、陈永正《王国维诗词全编校注》、陈鸿祥《人间词话·人间词注评》、叶嘉莹、安易《王国维词新释辑评》、祖保泉《王国维词解说》等。对先生其他著作的注疏则有俞晓红《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笺说》、胡平生、马月华《简牍检署考校注》、马美信《宋元戏曲史疏证》、房鑫亮《王国维丙辰日记注考》等少数几种。

另外，在先生著作的选编上，较有特色的有商务印书馆 2001 年版《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4 年版《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佛雏选编的《王国维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6 年版）、傅杰选编的《王国维论学集》、虞坤林选编的《王国维在一九一六》、周锡山编校的《王国维文学美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 1987 年版）、《王国维西方哲学美学论集》（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4 年版）、《王国维中国哲学美学论集》（北

岳文艺出版社 2004 年版)等。但在各种选本中,仅姜东赋、刘顺利选注的《王国维文选(注释本)》(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6 年版)等少数本子有注释。

(三)对先生学术思想、治学方法等的分析述评

这方面的著作为数不少,而尤以就《人间词话》、“境界说”和哲学美学思想等开展的研究、讨论最多。代表性作品有陈元晖《王国维与叔本华哲学》、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佛雏《王国维诗学研究》、聂振斌《王国维美学思想述评》、萧艾《一代大师——王国维研究论丛》、陈鸿祥《王国维与文学》、《王国维与近代东西方学人》、张志建主编《王国维学术思想研究》、王宗乐《苕华词与人间词话述评》、姚柯夫《人间词话及评论汇编》、周锡山《人间词话汇编汇校汇评》、佛雏《新订〈人间词话〉·广〈人间词话〉》等。除此以外,还有四本学术论文集,即《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一)(二)(三)和《纪念王国维诞辰 120 周年学术论文集》,也是“王学”研究上的代表性成果。其他优秀著作还有很多,大多能在静安先生学术论断或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上有所阐述、揭示。

(四)关于静安先生研究的论文资料

据笔者根据读秀学术搜索(<http://www.duxiu.com>)的统计,截至现在,静安先生研究论文在 3000 篇以上,这个数目和董方奎先生编《梁启超研究著论目录》(崇文书局 2010 年版)所收梁启超研究论文的数量是差不多的。从论文的内容看,包括了静安先生研究的各个方面,以《人间词话》、“境界”说、《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史》、静安先生和雪堂先生的关系、静安先生死因、静安先生学术成就述评、静安先生学术思想以及治学方法研究述评等方面的文章为多。

(五)学术会议和学术研究团体简况

针对静安先生学术研究召开的专门学术会议有几次:

其一,国际王国维学术研讨会。1987 年静安先生诞辰 110 周年之际,

由华东师范大学和海宁市政府共同筹办,中外学者共八十多人参加。这次会议是静安先生研究的第一次国际性的学术盛会。与会学者提交的论文有八十多篇,论文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回顾总结了静安先生学术研究的情况,其中的31篇后来被选编为《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其二,首届“海峡两岸王国维学术研讨会”。由海宁市文联、北京师范大学汉字研究所、台湾中华两岸文化统合研究会、清华大学国学研究所等联合举办。于1994年8月25日到27日在海宁市召开。来自海峡两岸的四十多名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大会收到论文17篇,本次会议以研究静安先生在文字和文学两方面的学术成就为中心议题,分别就静安先生的思想、文艺理论体系、古文字和音韵学研究方法等问题作了深入研讨。

其三,纪念王国维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由北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香港大学、台湾新竹清华大学中文系联合举办,于1997年9月5日至6日,在北京清华园举行。大会共提交论文37篇,后汇编为《纪念王国维诞辰120周年学术论文集》(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其四,‘97王国维戏曲学术研讨会。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浙江省文化厅、海宁市政府联合举办。于1997年10月16日至18日在海宁召开。3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提交论文20余篇。对静安先生在戏曲研究上的历程、方法、贡献、戏曲史观、成功原因等作了探讨论述。

其五,纪念王国维诞辰130周年暨国际学术研讨会。据报刊消息,此次会议于2007年10月11日在海宁市举行,与会者就静安先生的学术成果、治学精神展开了交流和讨论。

其六,王国维与中国现代文论创新国际学术研讨会。由中国社科院《文学评论》杂志社、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苏州大学文学院、嘉兴学院以及嘉兴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共同举办,于2008年11月1日至3日在嘉兴召开。与会七十多位学者围绕“王国维与中国现代文论创新”这一主题,开展了热烈、深入的研讨。

其七,“王国维与中国现代学术”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王国维全集》出

版座谈会。会议于2010年5月28日至30日先后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和浙江海宁召开。这是在《王国维全集》出版之际召开的又一次国际性学术会议。海内外50多位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大会收到中外学术论文30余篇,内容涉及:王国维与现代学术、西学、乾嘉学派等关系的研究,王国维的西域史、蒙元史、文学史研究,王国维手稿、全集的整理工作和藏书研究,王国维简牍学、金石学、出土文献研究,王国维与晚清民初的教育和新史学研究,《观堂集林》版本比较研究,王国维与学术界学人的交往,王国维之死心态的研究,王国维研究的反思等,体现了当前王国维研究的前沿动态和研究水准。关于会议的详细情形,可参阅于文善撰《王国维与中国现代学术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载《史学史研究》2010年第3期)。

研究静安先生的学术团体有浙江海宁的王国维研究会,该会在静安先生研究上做了大量工作,并编有《海宁名人研究资料第一辑·王国维研究》等。

另外,在静安先生研究中,特别要提及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学所。华东师范大学史学所的几代学人为静安先生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他们不仅多方搜集资料,积极编纂先生全集,同时也在静安先生的研究上做了许多具体工作,并有多项学术成果。最新的《王国维全集》就是他们惠及学林的重要成果。

(六)港台和外国研究概况

在国际性王国维学术研究会议上,往往有港台和外国学者参加并提交论文。

据陈鸿祥先生《台港与海外王国维研究概览》一文(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1992年第1期),台港学者研究静安先生的侧重点,是研究与评述静安先生《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静庵文集》及其《续编》所收文学、美学论文中文学、美学观点,兼及先生生平、思想,重要作品有叶嘉莹的《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王宗乐的《苕华词与人间词话述评》、罗忼的《王国维与清真词》、王德毅的《王国维年谱》、王郭静姝编《王国维

书目索引》等。在欧美,除静安先生“甲骨文字”和“敦煌塞上”之遗文的研究有重大影响外,静安先生的文论,与刘勰、王士禛的论说一起成为西方学者研究的对象,重要著作有阿黛尔·奥斯汀·里基特英译《人间词话》、威斯康辛大学教授周策纵《论王国维的人间词》,美国史密斯女士《王国维的早期思想》等。现在距陈先生发表此文又过去了二十年,港台和海外静安先生的研究当有了更多更大的进展和收获,请读者诸君多加关注。

据笔者所知,台湾 1985 年度何培齐的硕士论文《王国维对京都学派的影响》、2001 年度张美娟的硕士论文《王国维人间词话研究——以人格三境界美学意涵为诠释进路》均堪为静安先生研究中的优秀论文。

综上所述,对于静安先生研究,我们可得到以下几点印象:

第一,历来对静安先生的研究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无论专著,还是论文,都以对先生生平、学术思想、学术成就、治学方法、死因、和雪堂先生关系、哲学美学思想、文艺理论、《人间词话》、《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史》、诗词作品等的研究为主。而对先生史学、文字学的研究则大多止于阐述、称颂,对史学、文字学著作本身直接的研究较少。

第二,除《人间词话》和诗词作品外,对静安先生作品的注释笺疏为数不多。

第三,《王国维全集》出版后,先生全集已无遗憾。选集虽有多种,但为满足各个层次的需求和更好地开展研究工作,在选集编纂、注释方面还有待产生更好的本子。

第四,静安先生往来手札是研究静安先生无可替代的第一手资料,学者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整理汇编、写信时间考证排比、名物注释、生平和学术研究历程发掘梳理、和同时代人的交往情形研究等。先生往来手札之大部分已整理发表,但根据相关文章可知,仍有少部分由于种种原因还没有得到整理,主要包括雪堂先生来札 220 余通,他人和静安先生往来手札少量。这是有待学术界进一步努力补充完整的。另外,对手札本身及其所反映出的史实的研究也还不足。当然,像《王国维未刊来往书信集》最近才得以结集出版,学者还没有来得及开展研究。

第五,先生著作的初稿往往先发表在学术期刊上,而后定稿才整理收入集中,但定稿与初稿之间往往有较大的不同,这方面的比较研究还不太多。

第六,先生和同时代人的交往,除各家年谱中有所论述外,专著仅有萧艾《王国维交游录》(载所著《一代大师——王国维研究论丛》,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但较简略。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可喜的是,参加“王国维与中国现代学术”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学者李庆、邹振环、彭华等已经开展了一些工作,并已在静安先生与东文学社学人关系、静安先生与巴蜀学人交往等方面撰有论文。

第五,在充分收集资料、广泛开展研究的基础上,是否将来可以编纂《王国维研究论文资料索引》和《王国维词典》,从而把对静安先生及其学术的研究做得更好。

四、王国维先生与罗振玉先生的交往

罗振玉,初名宝钰,后改名振玉,字叔蕴、叔言,号雪堂、永丰乡人、贞松老人、松翁等。清同治五年(1866年)生于江苏淮安。1898年,与蒋斧等在上海创办东文学社,热心农学和教育事业。1906年,至北京在学部任职,晚年追随溥仪小朝廷,任职伪满洲国。1937年后,辞居旅顺,闭门著书。1940年病逝。雪堂先生毕生殚力治学,著述等身,在甲骨文字和汉魏六朝碑刻等方面的研究上均有重要著述。尤其是在搜集、整理、编纂、研究、刊布、传播学术文献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现在看到的,不管是台北大通书局的《罗雪堂先生全集》七编一百四十册,还是西泠印社版的《罗雪堂合集》三十九函一百八十八册,都是煌煌巨著。

雪堂先生于静安先生初为师友,后为儿女亲家。二人不仅在生活上和政治上关系密切,尤其在学术研究上互为良师益友。1898年,静安先生到上海后,抽时间进入雪堂先生所办的东文学社学习,从此即受知于雪堂先生。后为雪堂先生翻译农学书籍、编辑《教育世界》、《国学丛刊》、《雪堂丛刻》等杂志。1911年底,二人相偕至日本避居,在此期间,更是在学术研究

上互相砥砺。不仅合著了《流沙坠简》、《齐鲁封泥集存》等著作,另外,如雪堂先生《殷虚书契考释》多采静安先生之说,静安先生著《宋代金文著录表》、《国朝金文著论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等,亦得与雪堂先生商榷之益。从而成就了举世皆知的“罗王之学”。可以说,二人之间,如鱼得水。虽然二人晚年有所误会,但是综观他们一生的交往,是堪为学界典范的。这是可以从现存二人往来手札中得到证实的。

本编名为《要目》,只分类收入与静安先生研究直接相关的重要资料,期冀能在静安先生的研究上,为大家提供一些方便。

热忱欢迎读者诸君不吝批评指正。